

今天，聊下文革吧。

之前，岱岱写过文革。

那时还是简书时代，评论区瓜友可以讨论交流，写文革的那几篇，评论区吵架的厉害，拉出来一看，楼盖了几百层。

但最终往往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瓜友们的讨论以互相谩骂告终。

简书写过几篇文革后，岱岱就不写了，撕裂太大争论太多，而且大多是无意义的。

岱岱只能在后面的《去苏化》三篇等文章中旁敲侧击的描下文革，但一直没系统性论述过。

今天，依然是对文革的一些吉光片羽阐述。

鲁迅对红楼梦有一段点评的很好：

对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岱岱对文革，也有类似的一段点评：

对文革十年，历史学家看到乱世一片，政治家家看到政治斗争，外交专家看到国际影响国内，革命家看到人民主权

是的，文革有很多切面，是各种因素交融在一起才导致的，只从一点出发，对文革只能是盲人摸象。

之前，去苏化三篇就用历史详细的讲述了其中一个切面。

那就是国际局势是大气候，中国国内政治生态是小环境。

大气候能极大影响小环境，国际会极大影响国内。

彭德怀倒在庐山上就是因此。

还有林彪，他是宁愿亲苏也誓不和美缓和的，坚决反对周邓所走的对美外交路线，所以林彪就算没有那个坑爹儿子，他最后也依然会被决定联美抗苏的主席拿下。

这是国际的一个切面。

前几天，岱岱本来想写七千人会议。

突然想，不如发散开来，就七千人大会前前后后的历史脉络串起来，让大家看的更明白。

是的，今天的文革切面主题，是毛刘矛盾。

刘，刘少奇也。

文革的爆发，政治斗争的点就是毛刘，而不是毛周。

毛刘从合作无间到最后翻脸决裂，可以用这几个阶段概括。

第一阶段：1941-1945，延安整风，合作无间

这一阶段是天作之合。

教员虽然军事无敌，但马列理论是短板，被苏联视为山沟沟里的主义，而当时苏联是父皇帝的做派，将中共视为儿皇帝，多次干涉中共路线乃至人事。

但苏联搞的那套在中国行不通，导致了巨大的损失，这让主席产生了抗拒苏联影响力的想法。

帮主席落实这一想法的关键人物，就是刘少奇。

刘少奇留学过苏联，读的是正儿八经的马列理论，本身理论水平极高，对党内那批惟苏是从的人很有一套。

教员自己也恶补知识，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一个细节，很少引用他人文字的教员，在那段时间却很多次引用刘的话。

甚至还说出“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的确，刘的笔杆子对主席帮助很大。

而刘虽然留学苏联，但不和王明他们搞在一起，刘和主席一样十分心痛苏联的瞎指挥，对党内左的的一派很反对。

两人还有同乡之情谊，简直天造地设。

于是，在刘的帮助下，教员搞出了延安整风，搞出了毛泽东思想。

这等于中共的成年礼，等于中共脱离苏联国际共产第一个拥有自己思想自己领袖的政党。

对主席个人也是意义非凡，他第一次成为全党核心全党领袖，可以不受干扰的指挥工作，为49年的胜利打下基础。

也正是整风的胜利，让主席对刘十分赏识，而当时战争年代有朝不保夕之危，我们想办法搞接班序列，刘小主席5岁，所以刘被列为接班人。

甚至搞出了第三接班人，彭真。

当时的想法就是，战争年代死人太多了，谁也保不一定会出事，后面还要去重庆龙潭虎穴见蒋介石。

如果主席出事，刘接班，如果刘再出事，彭真接班。

后来彭真负重任去东北耕耘，结果搞砸了，林彪意见很大，林彪闹到主席面前，主席撤了彭真让林彪总督东北，派了一个高

岗去东北当林彪的后勤萧何。

彭真出局了，而高岗东北干的很好后来又五马进京一马当先，想起彭真曾当过第三顺位，就下意识的以为他也能和刘竞争东宫，野心就膨胀了。

后来高岗的事去苏化里写的清楚了，大家懂的。

第二阶段，1949-1957建国初期，确定接班人

彭真出局后，第三顺位先后有高岗陈云邓小平的竞争，而第二位置一直是刘，很稳。

1957年，主席对赫鲁晓夫谈接班人的问题就说：

“我说我们这些人（出生），包括我（1893 年）一个，总司令（1886 年）一个，少奇同志（1898 年）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1898 年）、陈云同志（1905 年）跟邓小平同志（1904 年），他们是少壮派”。

这里，周是排在刘之后的，刘是仅次于朱的存在。

记住，57年时，主席是考虑都没考虑林彪的。

实际情况上，主席也对刘充分信任，他只留军国大军，政府工作是退隐二线的。

基本让周刘二人干经济工作，他负责抓总路线。

即使后来三年跃进干的很差，也是倒了一个愣头上书的彭，没有触及到刘的地位。

1959年庐山会议，1961年主席对蒙哥马利说：

“主席谁来当？七个副主席第一个是刘少奇。前年开会选了国家主席。原来两个主席都姓毛（党主席和国主席），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了。过几年两个主席就都姓刘了。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

是的，庐山会议是主席和彭的分道扬镳，并非和刘的分道扬镳。

真正让两人分道扬镳的事，还是后面两个会。

第三阶段：裂痕产生：1962年七千人大会

三年跃进，饿死了很多人，全国上下一片灰心。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全党的自大心理，第一个五年计划太过于成功，让上下都以为工业化很简单，不难，骄纵轻敌。

也有主席的冒进心理，去苏化写了，当时苏联在守成没有进取心，主席搞的这么激进急于建成社会主义，是存着趁机和苏联抢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的心的。

也有下面造假邀功的心理，当时全党最大的问题不是走资派，而是封建派，是封建残余弥漫，古代有地方官搞祥瑞邀功，近代有亩产万斤放卫星邀功。

更有中央一批人不去制止反而煽风点火，当时邓去视察亩产万斤没发现造假问题，刘去视察还说隔壁省都几万斤了你也要加加油，科学家钱学森也没有保住贞洁，面对主席的疑惑求问，亩产万斤不可能吧，我当年耕过田的，钱学森说，如果日照热

量和水分养料完成转发，从科学角度是有可能的，主席从半信半疑到信了。

各种因素下，有了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

对三年进行讨论定调的，就是62年那次七千人大会。

共有省市、国家部门、地县以及部队的领导共七千多人参加，故而得名七千人大会，基本号召了全国县一级的领导干部来北京，是有史以来覆盖面最大的一次会议。

主席在当时已经认清到自己的路线冒进有错，主席听从邓的意见搞了这么扩大的7k人会议，他本意是承认错误，但错误不能让主席他一个人背。

主席想让集体背这个决策失误的锅，这样好认错，还重新制定政策出发。

他点名了周朱陈邓几个人在会上讲话。

这三个都领会到主席的意思。

周恩来的讲话的主旨就是，工作做的不好，责任主要在我周身上，不怪上头路线不怪下面执行，大家继续团结一致解决困难。

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成绩是伟大的，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次要的。

朱德不是笔杆子，自己又是老实人，朱德为这个7k会讲话，三易其稿，最后来个和稀泥，不怪上头路线，继续十年规划赶英超美，不怪下面执行，没办法，搞社会主义肯是有困难，大家要继续继续努力巴拉巴拉。

真是难为朱老总了，和稀泥和的三易其稿才憋出来。

水平最高的，其实是邓的讲话。

那个大会，大家都讲经济问题，但邓的确有水平，有见解，他敏锐的看到了政治问题。

他讲话的主题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

邓分析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种种弊端，如：官僚主义现象，突出表现为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思想僵化、墨守成规、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等等；权力过分集中现象，“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家长制作风，“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大搞特权，特殊化。

对于诸如此类的丑恶现象，邓小平指出：“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他说：“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作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可以说，出了经济民生问题，只谈经济民生是治标不治本，只有谈体制问题，才是治本。

不要觉得邓谈体制是针对主席，当时还没文革，主席是亲笔批示不要搞个人崇拜的，而且主席自己也有论十大关系，论述过学苏联会有体制僵化家长制的毛病。

所以邓的这个针对体制讲话，实际上是对主席论十大关系的一个有力补充。

主席是很赏识邓的洞察力和胆魄力的，在周朱都讲经济问题的时候，他能讲也敢讲到体制问题。

邓是真的有水平，不怪主席对他三起三落都始终不忍拍死，当年四人帮跪下抱住主席的大腿哭诉，说有邓在他们以后就永无宁日让主席对邓痛下死手。

主席是一直重复四个字“**人才难得，人才难得啊**”，始终没有像对刘那样开除党籍一样，扼杀邓的政治生命。

主席识人一流，惜才一流。

7k会还有一个，让主席印象深刻，就是陈云。

主席亲自请陈云去讲，陈云却不讲。

陈云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不讲。

在当时被认为是陈云你好大胆，是主席都请不动的人。

可事隔26年后，陈云解释说：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主席难堪。”

是的，陈云是本色人，你让陈云讲，陈云肯定不会像老实人朱德那样三易其稿，为主席掩过。

也不可能像周恩来那样违心，把一切都推到自己身上，让上下都满意。

陈云是个经济专家，也没有邓那样的政治洞察力，邓讲这个属于另辟巧径，讲的多深刻也不会挨骂。

因为主席听邓批的，他不会觉得邓批体制是批自己，主席会觉得邓批的体制是他也痛批的封建残余和苏联弊端。

陈也学不会邓的另辟巧径。

所以让陈去讲，他肯定如实讲，会说上面路线定错了，上面要赶英超美搞的如此冒进，也不是时候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搞什么农村大食堂饿死人。

陈云去讲，肯定会如实讲，这就不可避免的将部分责任失误归于主席头上。

所以陈云自己说：“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主席难堪。”

他宁愿选择抗命不讲，也要保持沉默。

而和7k上不发言截然相反的是，一旦不开这种全党公开的会，在西楼开小规模的内局会议时，陈云就放开讲了。

是的，在7k会议后又有一场西楼会议（主席不在场去外地视察了），陈就花了半个月时间调研做了报导，基本讲清了经济发展的问题，修正了过左的路线。

这个时候，陈云就敢讲了，把问题失误都讲出来了，不避讳。

可以说，西楼会议上陈就很敢讲，但前面的7k会上，陈就保持沉默。

陈对主席，做不到违心的掩过唱颂歌，但做到了保持主席的体面。

就是因为陈云的这种做法实在太难得，主席在文革十年都没动陈，让陈安然了十年。

和陈云截然相反的，是刘少奇。

刘少奇为筹备7k会，也去考察。

他选择考察的地方是自己的家乡。

同吃同住了半个多月后，他才真正的看到了当时真实的中国。

真的是人民食堂饿死人，真的是人相食，真的是惨不忍睹。

考察结束去北京开会前，刘少奇面对父老乡亲大家一鞠躬，说：

“乡亲们，这两年大家吃苦了，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对你们生活产生影响。工作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有的老乡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看说得很对。也不要全怪基层干部，下面的错误，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说粮食过关了，下面就到处放卫星。上面说一大二公好，下面就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所以上面要负一大部分责任。中央要负很大责任。大办食堂、大办水利都是中央提出来的。问题的根子在中央。我是副主席，考虑问题不周，我向大家赔礼道歉。”

刘少奇是心里有人民的。

他对乡亲父老说了这样的话：

“我一走40年，今天回来不是衣锦还乡，而是给乡亲们赔礼来了，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让父老乡亲吃苦了。我一定想出办法，尽快地扭转这个困难局面，请父老乡亲给我两年时间，两年以后，如果大家仍然象今天一样饿肚子，你们就扒掉我的祖坟！”

刘少奇心中怀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记忆，牢记着两年不扒祖坟的誓言，带着内疚沉痛的心情，离开湖南老家，其北京

开会了。

会上，刘少奇发表讲话。

他对全国困难的经济形势并没有掩饰，大胆承认出现了一个后退，大的马鞍形，实实在在给大家透了底。

最令人震惊的，是他破天荒地提出困难的原因是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他突破了过去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的惯例，提出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

“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

“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并且剑指某人：

“人相食，你我是会上书的”。

“这个问题，现在不讲，将来要讲；活着不讲，死后要讲”；

对主席的赶英超美，刘给了体面，没有否认，但他不提。

不提等于体面的否认。

并且将十年规划改为五年规划，说我们还是稳妥些。

7k上会议，刘少奇的大胆讲话，的确震撼人心。

当人们听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一句话时，起先，大家一下子仿佛怔住了，接着，便爆出经久不息的响亮的掌声，掌声持续响了有5分钟，也可能是10分钟，连服务员都跑进屋里来了，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多年后，一位亲历参会者接受采访时回忆：“刘少奇同志讲话，按照我的经验，准是宣读定了稿的报告，会后一定会下文件，自己做不做记录没关系。但确实没料到那次刘少奇同志没念稿子，而是口头阐明报告的精神实质。他的湖南口音，我一时适应不了，过了一会儿终于适应了，才奋笔疾书起来。”

七千人大会属于临时动议，准备工作只有两个月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仓促，像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起草出来送给主席审阅时，距大会的召开仅差一、两天时间，主席有什么意见，已经来不及切磋修改了。

刘少奇当年的这个表现，怎么说呢？

唉，岱岱的评价是

初心是好的。

但不够实事求是。

方式也不正确。

后果更不好。

首先，初心是肯定有的。

刘少奇对乡亲们说，我对不起你们你们就扒我祖坟，那一刻，刘少奇的形象是高大的。

但反思问题也要实事求是啊。

亩三年跃进，主席固然有领导责任，上有所好下有所效搞出亩产万亿的卫星，但在座所有人都有领导责任啊。

刘邓都去地方视察过亩产万斤，你们没发现猫腻吗？

饿死人是三年都有，并非刘去视察那个时候才有，刘也没有在三年跃进的第一时间及时发现饿死惨象。

所以，如果要论事求是，邓那个反而更实事求是，是体制的问题。

封建残余+学苏联体制僵化，责任上上下下都有，主席有领导责任，其他领导也有责任，下面也有执行责任。

这才是实事求是，所以刘的讲话对主席批判的有些太过了。

说方式不正确。

和陈云对比，方式是不对的。

7k人会议是怎样的一个会议啊，这些话你关上门对政治局的人说，主席可能还没感觉，你在7k上这样说，就是让主席下不了台。

看陈云，7k会上我一言不发，关上门的西楼会议我重拳出击，主席一点被冒犯的感觉都没有，文革十年还保了陈云。

所以方式的确不太对。

结果不好，是真的不好。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的心情，是在以后的讲话中人们才慢慢明白的。

虽然刘强调错误不是路线问题，强调大跃进的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但这根本消除不去主席的郁闷之气，这口气是憋下了。半年以后的北戴河会议上，主席就说：

“1960年下半年，1961年，1962年上半年，都讲黑暗，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这不是在压我？压了我两年了，难道讲一点光明都不行？”

1967年2月3日，主席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长巴卢库谈话时曾说：

“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是的，7k会上，一腔热血为民请命的刘，没有足够的实事求是，也没采取好方式，选择了那样的讲话，导致主席对刘开始有误解，埋下了毛刘决裂的祸根。

一个彭德怀，一个刘少奇。

都是一腔热血上书发言，结果姿势不太对，后果很严重。

所以岱岱这种更不能从政了，岱岱是热血初心有余，但经常上头有情绪的人，过于莽撞冲动，岱岱要放在当年从政，也是彭刘二人命运。

第四阶段：矛盾激化，1964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7k人会议是62年年初，埋下了祸根。

但后面还是相安无事。

主席不是气度小的人，他能容五湖四海，国家放第一位，个人得失放很后面。

在当时，他也没有对刘采取什么措施，因为他还认为刘是有赫鲁晓夫的倾向，但还没到那个地步。

此后，还是刘负责经济工作。

但是，7k会后的一年多时间，主席还是认定人民公社好，三面红旗不能倒。

主席这个坚持也有赫鲁晓夫的原因。

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谈时，表示了对中国搞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说："中国人正在组织公社。在苏联

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

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激怒了正在庐山的主席。他给时任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写信指出：

“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主席还是坚持这个经济路线，这就导致了和刘的矛盾不是得到缓和，而是激化。

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主席指责邓子恢主张包产到户，同时不指名地批评刘没有顶住“单干风”，思想右倾。

不点名批评，还是留有情面。

但后面，因为刘邓等人在经济一线知道真实情况，顶不住主席的压力违心搞三面红旗，主席很生气。

于是主席发起了四清运动。

从国内形势看，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使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从认识这一危局使得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导致了主席大讲阶级斗争，决定在城乡发动四清运动。

讲的大白话就是。

刘邓和主席对经济路线不一致，但刘邓无法说服主席，于是他们出下策，就是明面上搞三面红旗，实际上差异化执行，希望能把经济搞活。

但在埋下裂痕的主席看来，怎么回事，怎么下面说着往东走却往西走？我被架空了？

所以主席发动阶级斗争的四清运动。

这一刻，主席并没有笃定刘是架空他的主要人。

还认为是地方官僚阶层架空他。

一个关键魔鬼细节就是，主席是让刘去发动四清运动的。

是的，如果主席笃定是刘架空，那么以主席的政治智慧，不可能火上浇油，选刘去主导这个四清运动。

所以，在四清运动开始之时，主席的想法是，地方架空了他不听他的号令，所以刘也管不住地方，不如让刘去搞四清，管住地方。

但是，四清运动中刘搞的走样了。

搞的比较扩大化，文革那些批斗武斗在四清中就有了雏形，喷气式罚站也是四清第一个搞出来的。

而且四清运动中，刘打破了女人不得干政的常规，让他的妻子王光美出镜去管事，马上让王有了第一夫人的名头。

搞的江青妒忌，在主席身边一直告状，说王光美哪里是抢我的风头啊，是刘少奇在抢你主席的风头。

刘少奇打破常规让夫人王光美的出山，埋下了后续主席用江青出山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祸根。

矛盾在蓄积，只差点燃了。

点燃的时间，就是64年的经济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期间，毛刘在“四清”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是继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高层一次最严重的争论和斗争。

全国“四清”运动基本是按照刘少奇的路子进行的，在主席看来，他似乎被架空了。

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前，邓对主席说：“这会不重要，您老人家不用参加了。”本意是想说，这样的会议应该是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事情。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主席很介意。

邓的话反而激起了他的逆反情绪，他坚持要参加。

到此为止或可作罢，偏偏刘少奇又加了一句：“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

一个不让参加，一个让参加却不让说话。主席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对待，心理上无法接受。

主席反问：**“我为什么不参加?为什么不能说话?”**

1964年12月15日第一天的工作会议主席是参加了，但两位主席话分两头，各说各的，这让很多不知情的大区和省部级领导们一时思路跟不上趟，满腹疑惑，不得其解。

28日下午是中央常委会议，两位主席依然是相互插话，随意打断，各不相让。

刘少奇总在谈“四清”的主要矛盾既在党内，也在党外，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是相互交叉着。

主席也不相让，说“四清”主要矛盾是群众与走资派的矛盾……刘少奇马上插话：“我个人认为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参加会议的其他人暗暗为刘少奇捏着一把汗。

大家看得出来，刘少奇总是打断主席的话头，此举一定会让主席动怒。

果不其然，主席动了大气。

第二天，他早早拿着党章和宪法坐到会场上，以示抗议。

一开场就申明：第一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大家说有人不让我参加会，也不让我讲话，对不对？

主席的话震动很大，全场气氛紧张，据说在场的许多军队将领都站出来为主席撑腰。

主席看到会场的架势，也不愿意闹大，就没有点名。

会是不参加了，他转身离开了会场。

事后安子文找到刘少奇谈话，他善意地提醒：“刘少奇同志你要顾大局，你要认真地检讨，你为什么打断主席的话？要尊重主席啊。”

刘感到自己的问题，做了检讨。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竟然召开了一个月，戏剧般地被分为两个阶段。前半段会议是由刘主持的，主要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根据汇报情况与“四清”中提出的问题，会议制定了一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文件共有十七条，故简称《十七条》。

会议后半段是主席将散会人员招回来继续补开的会。主席亲自主持，重新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文件标题与刘少奇指定的那个一字不差，但内容却有二十三条，简称《二十三条》。

打开文件就不难发现，这不是简单地增加了六条，而是基本针对刘少奇的《十七条》而制定的《二十三条》，很多内容与刘的版本都是针锋相对，彻底推翻重来的。

是的，这次大会的争论，让主席对刘产生了这样一个误断：

原来不是地方在架空我，是刘在架空我！

当然，这是一个误判，还是一个判断，历来都是众所纷纭，各人有各人的看法。

这次会后，两人再也回不到以前的关系了。

64年年末的这个会。

65年上半年，主席重上井冈山，内心酝酿文革计划。

65年下半年，主席开始吹风准备，年底对地方开会说：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主席讲的中央出修正主义，指的就是刘少奇。

可以说，从那时起，主席已经公开号召全党向刘少奇造反了。

1966年5月设立文革小组，8月海内张贴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剑指刘某人，11月《批判海瑞罢官》扩大化。

文革在66年，终于还是爆发了。

69年，刘少奇同志，死。

但是，文革在刘死后，依然还是持续了7年。

有人说，是因为毛刘矛盾后还有毛周矛盾。

大错特错。

这是将主席视为权力斗争高于一切的人了。

说了，文革有很多综合因素使然，路线斗争权力斗争，只是其中一个切面。

在刘死后，路线斗争告一段落。

主席的文革，是真正彻底的还权于民，是一场堪比巴黎公社的人民绝对民主社会大试验。

这场大试验，是如此的绝对民主，是如此的广泛民主，是如此的彻底直接，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在中国之前没有，之后更不会再有了。

但结果是，文革失败了。

人民绝对民主的社会大实验，最终因高层政治动荡、人民素质不足、生产力水平落后、国际环境恶劣等总总因素下，最终走向失败。

也因为失败了，所以文革和主席都被泼脏水，让很多后人对那段历史产生了一边倒的批判态度。

却无视了那个十年给我们留下多少的宝贵经验教训。

可惜，可叹。

回到正题。

今天，岱岱提供了文革的一个切面。

去苏化提供的是国际局势的切面。

今天提供的是毛刘矛盾的一个切面。

以后有机会，将其他切面都一一补充起来吧。

最后，岱岱要重申，如果将其文革视为单纯的权力斗争游戏。

认为毛刘毛周矛盾贯穿十年。

这是真的把主席看扁了。

也是将十年文革最宝贵的精华给抛弃了。

最后感叹一胜。

从62年的七千人大会，到64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如果中间能有些弥补，如果刘能圆融圆滑一下。

那么齐心协力之下，可能中国后面就不会有这么多惨痛和动荡了。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